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论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泽东  
论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中)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组织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

王正萍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第四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 一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和基石

#### 1.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

(1) 我们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

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般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2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页。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

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

(2)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就在于它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

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

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民粹主义者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因此他说，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谈起，从他们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谈起，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谈论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说，的确，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

的问题(你连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时，也正是研究“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证明我谈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诚然，我从来不说“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但是，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个人活动的产物。你说你在谈论“个人”，但实际上你当做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你，而你也脱离了生活。不仅如此，请你看看，你装进这个木偶的头里的是些什么东西，你宣扬的是些什么措施。你向劳动者介绍劳动组合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个组织。你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你看不出这个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这些办法丝毫不能消除生产资料(货币也包括在内)积聚在少数人手里(这种积聚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你是从劳动者的思想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他指出民粹派关于“个人”的论断空洞无物后接着说：“实际上社会学总是力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任何一个想要解释历史进化中的某个重大关键的尝试都使人确信这一点。当谈到‘历史人物’和‘伟大人物’时，总是力图把他当成某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那个时代的代表，

而把他的行动、他的成败看成过去全部事物进程的必然结果。”这种想要解释社会现象即建立社会科学的一切尝试的总趋势“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基本过程的学说上面。既然个人不算数，那就需要找出另一种因素来。这种因素就是社会集团”。司徒卢威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说在完成着社会学的总意图——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不仅如此，阶级斗争理论第一次完全而彻底地贯彻了这个意图，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程度。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给“集团”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这个概念本身极不确定，可以随意了解，既可以把宗教现象也可以把人文、政治、法律等现象看做区分集团的标准。而在上述每一领域中可以用来区分这些或那些“集团”的固定标志是没有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用语“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所包裹着的社会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客观的一般科学上的重复性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种重复性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的”和“德

性很高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信条，这种道德的范例我们已从那位以哲学家的神情谈论历史的不适当性和“科学光芒”所指明的道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看到了。正是这些论断被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打破了。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由于以往那些在仅有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看出自然界规律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已被推翻，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也就得到了确切的解释。主观主义者关于一般“社会”的论断，这种毫无意义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连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有可能概括为几种独特的社会机体这一点都未阐明）的论断，已被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研究代替了。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场合”，“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

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  
《列宁全集》第1卷第386—389页。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派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7页。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

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他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828页。

（3）马克思的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但是在每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

句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05页。

瓦格纳先生对我的论述不满意（厌恶）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顺他的意，没有按照德国国粹教授的“愿望”，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德国社会（诚然很晚）正由封建自然经济，或者至少是由这种经济占优势，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教授们的一只脚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因此，我们的 *vir obscurus*（蠢汉<sup>①</sup>）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sup>②</sup>）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4—415页。

## 2.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给一切唯心主义当头一棒，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0页。——编者注

②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原编者注

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1—12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1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5月底—1878年7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